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创新和优化配置^[*]

张永刚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发展动能,其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生产要素配置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减轻社会制度约束等诸多方面。伴随新质生产力发展,诸多变革因素将持续推动生产要素不断调整现有配置状态,生产要素间的互动及共同作用机制也将更为复杂,这要求从要素配置演变与经济增长间的互动视角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分布上趋向平衡,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对要素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并提高组合效率,完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形成良好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技术驱动;优化配置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5.007

人类社会的发展跃迁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置身数字智能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要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规律,顺应发展趋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应该说,新质生产力相关阐释理论是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大局和文明实践的高度,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术语革命”。关于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形成了生产力的基本内核,生产力的发展则依赖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并嵌套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框架之内。事实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时代体现,正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鉴于经济体制是一个多要素复杂运动系统,具有一定连续发展性和自身规律性,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是否高效合理深度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效率。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推进劳动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坚持赶超型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回答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不同生产要素的创新

作者简介:张永刚,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23BKS117)的阶段性成果。

性配置问题,方能通过要素配置结构和模式调整解决要素配置中的失衡问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挥正向拉动作用。

一、生产要素创新及其优化配置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生产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2]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系统。在威廉·配第看来,土地和劳动在财富创造中居于重要位置,并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从而形成生产要素的二元论。^[3]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亚当·斯密在考察产业资本运转机制的基础上认为资本是构成生产过程的最重要要素,从而形成生产要素的三元论理论。^[4]马克思则基于现代生产力和生产一般的双重视角对生产要素构成进行分析,提炼总结出劳动过程三要素。他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5]其中,生产资料又包含着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所以三者共同构成劳动过程三要素。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发展动能,其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一)科学技术对生产要素的拓展和配置模式创新发挥深刻重塑作用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其形成和发展受到技术革命、生产要素创新及其优化配置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不断革新来实现的。科学技术通过创新生产要素与劳动组织方式,对社会生产过程具有感性直接的重塑作用,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要素配置体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6]所以,关乎生产资料发展水平的技术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引擎力量,技术在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之下被累积性地创造出来,持续改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及其配置方式。科技创新不仅“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7]也通过“武装”和延伸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财富生产效率。马克思科学考察了资本主义“蒸汽磨”生产力取代传统落后的“手推磨”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其研究结论对理解新质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得以产生,这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得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高效化,产业不断迭代升级,生产要素以及劳动生产范式正在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其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特征,引领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技术革命的认识,也使其更加贴近现代生产实践。

(二)生产要素的具体构成形态和主次地位排序具有时代性、历史性、演变性特征

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模式变革,体现了生产要素发展不平衡的动态系统性规律。生产要素的创新包括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劳动资料的更新换代、劳动对象的优化选择等方面,因为这些要素具有不平衡性,所以需要将它们置于动态结构中予以创新性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生产要素发展是不平衡和不稳定的,不同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生产要素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是生活资料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劳动者和土地的结合是主要生产形式,从而构成以土地为基本要素的封建制度下的生产系统。伴随16世纪工场手工业的日渐兴起,生产工具成为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

介形式,“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8]所以劳动者的劳动对于生产力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生产系统的主要要素构成由土地转向劳动,土地成为一种从属性构成。后来,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转变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和机器系统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工人“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演变为卢卡奇所说的“客体化存在”,劳动“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9]在一系列变化中,劳动资料对于劳动者的支配能力日渐显现,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以固定资本的形式超越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地位,一跃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期,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信息产业迅猛崛起,最终导致数据在智能时代成为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如果说基于传统劳动要素,“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10]那么大数据则释放了主体意识客体化的新质态,并日益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地位。

(三)生产要素配置模式的经济关系限制规律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三大要素分析是对一般生产考察的结果,这三大要素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抽象构成要素”,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可见,对一般生产抽去具体形式的抽象要素分析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生产阶段的特殊规定性。“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12]故此,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同的特殊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不断并入生产力之中,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生产要素的具体构成,形成不同的生产要素联系秩序和系统构成。具体说来,不同质态的生产力及其运作往往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内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很明显,在马克思主义境域中可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即产品普遍商品化的社会关系和产品少量商品化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对后者来说使用价值居于主导地位,于前者而言则实现了“质”与“量”的颠倒、“内容”与“形式”的错置、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僭越。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通常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哲学运思的无意识范畴和平台。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的劳动价值论抽离了劳动的任何具体规定,将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劳动视作价值的源泉,这种抽象的哲学解读看不到人的社会物质条件限制,没有摆脱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框定。故此,《资本论》开篇对“庞大的商品堆积”的描述既是经济现象学阐发,更是对经济关系历史性的本质识别,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哲学运思的形而上学神话。在政治经济学叙事框架内,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以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大工业初期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取代旧有落后的生产力,并继这种社会革命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政治革命,从而人类社会进入了“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力的不断积聚和急速发展,如“瘟疫”般的经济危机甚嚣尘上,呈现出强大的杀伤力,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13]马克思指出,这说明“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4]置于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5]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一旦超出“旧胞胎”范围,并为广大无产阶级理解和把

握,“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16]以此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大局”背景下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决策,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把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框架内、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智能化、高效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创新性的生产要素配置,将重塑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进入新的阶段。

综上,生产要素构成与其配置模式的结构性质置换深刻内嵌于重大技术革新的发展之中,限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之内。新质生产力作为立足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提出的概念,也反映了我国在智能时代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路径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顶层设计。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好理论阐释,必须循沿从大机器时代到智能时代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探索相同技术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内要素创新和优化配置的不同可能。

二、从大机器到现代智能生产体系中生产要素演进规律的具体展开

生产要素创新及其优化配置必须遵循其特有规律,但是生产要素构成与配置模式怎样对生产力发展发挥影响,需要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之内去考虑。所以探思从大机器到现代智能生产体系中生产要素演进规律的具体展开,尤其在总结传统工业视角下被“辖域化”的生产要素及其扭曲配置的基础上,来探索智能技术视角下的生产要素创新及其配置优化的多样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传统工业视角下被“辖域化”的生产要素及其扭曲配置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7]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生活的大机器时代,人类不断地创新或改进工具的动力系统,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通过直接改造生产动力系统,解放了人手和人的体力,推动了大机器体系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各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18]大机器改变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传统手工业结合方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实现了现代生产力发展以来首次质的飞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创造性应用和结构优化配置均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逻辑,其发展模式与展开路径严重受阻。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经济关系极大“解辖域化”财富创造速度,但是也将其局限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抽象运作逻辑必然再辖域化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优化,成为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真正得到解放的只有资本主体,“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9]所以,劳动和技术以及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均被局限为资本运作的客体工具和中介,使得生产能力不能够被充分释放,最终导致生产要素的配置也被局限于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运作框架内,不能够最大限度释放各生产要素活力。

循沿马克思的考察理路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需要投入自己的情感、智慧、技艺才能完成生产活动。对此,马克思曾以马车业为例形象描绘,“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同时协

力地进行劳动。”^[20]每一个工种都是技术活,需要工人投入自己行业内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技艺价值。随着劳动过程的机器化,死劳动取代活劳动成为发出运转指令的固定资本,人的技能在日益精细的分工体系中越来越不重要,活劳动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资本要素取代劳动要素成为经济体系内的主导。可见,在生产要素的动态性发展中,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高效化必然导致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其中,20世纪初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出现,福特制迅速成为主要生产组织方式,其直接后果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广泛使用和劳动管理的简单化,进一步压缩了鲜活劳动要素的操作空间,而它对劳动力的高效率使用主要表现在对工人体力的压榨上。20世纪70年代,随着个性化、多样化的活跃市场环境进一步催生了后福特制的精益生产,社会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劳动过程的“再主体化”,或者如自治主义所说的“生命政治劳动”。福特制依托现代分工体系体现了生产资料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后福特制的再主体化过程则体现了劳动要素的“复归”。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发展突出反映了马克思对生产要素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见解。

当代左翼加速主义认为,现代智能技术快速变革和数据要素崛起蕴含着解放人的技术潜能,同构于马克思区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思想。左翼加速主义的技术“超信”虽然反映为一种现代平台资本主义发展情势下的技术乐观主义,但对技术在不同制度下的应用可能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论述,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二)智能技术视角下的生产要素创新及其配置优化的多样可能

新质生产力是在依循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体现了技术的延续和拓展,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生产力的积累和基础支持。但是,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生产工具、设备和技术,生产过程侧重手工化与机械化,而新质生产力则基于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当今时代,大数据技术体系加持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投喂和深度学习建构算法模型,推动脑力劳动的智能化,作为“一般智力”的数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力实现新的质性飞跃。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加速了劳动力、资本、能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21]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生产力,强调新兴技术的作用,以及这些技术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与以往的生产力革命根本不同,它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性的,不仅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会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智能时代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要素配置模式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数据要素的崛起及其创新配置

早在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就首次提出“数据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他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22]甚为明显的是,数据“摇身一变”跃居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开启了以数字技术驱动社会生产为主要表现样态的数字经济时代,成为智能时代创新生产过程的新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23]这实际上从生产力的高度深刻指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伴随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得到确证,大数据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内在结构、作用机制将深刻影响全部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配置。马克思对信息(在今天体现为“数据”)的重要性,曾经作出过基于传统大工业的时代情境的经典阐发:“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24]可见,数据要素的出现和地位的确立是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创生的新的生产要素。当然,数字时代的数据是以二进制形式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之中,但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论,这种数据不过是数字劳动加工的对象,本质上属于劳动对象的范畴。

可见,生产要素创新性变革一般性地使人的劳动能力超越了人体天然器官生理功能的限制,也使新的要素不断涌现实现创新发展。而新型生产要素的涌现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结构化配置获得多样的全新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国应该如何运用数据要素及对其进行配置的问题上,国内有学者提出,发展数据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应用的社会主义公共属性,方能适应我国发展现实。

2. 资本要素的社会主义应用及其创新配置

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作为现代科技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资本属性并不是该生产力的实体性属性。对我国来说,资本要素一度作为稀缺资源,同丰裕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的有效结合,促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高速增长。然而,一度困囿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存在的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阶段性赋予现代生产力以资本主义属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5]实际上,资本不是抽象层面上的一般存在,其关键特性在于能够产生新的剩余价值并实现资本积累,进言之,“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26]

在马克思早期对生产力开展的人本主义的批判中,他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资本同劳动要素的扭曲配置,指出“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27]从而在私有财产的操纵下成为以物的形式实存的生产力,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构成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上的不公正。随着马克思逐步聚焦具体现实并将资本视为理解社会历史的介质,他逐步认识到现实工业在异化劳动之外所具备的客观历史性力量,也就是“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28]的力量,从而“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29]由此,马克思开辟了合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得出资本的确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经济关系的结论。

三、以进求稳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创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可能策略

既然新质生产力体现的是生产要素的融合跃升,并且遵循一定的规律机制和发展模式,所以如何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导机制来推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就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有效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优势,强化数字技术的正向影响与社会分配机制的积极引导,是当下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

(一)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

毋庸置疑,构建生产要素市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趋势。对我国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始终迟滞于商品市场改革。以土地要素为例,在地方经济发展压力之下,地方政府

往往通过掌控土地市场而筹集资金,被称为“土地财政”,形成了依靠资源促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以市场化方式将数据、资本、劳动等要素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使各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推动产业结构较快变迁和经济高速增长。完善要素市场机制必须通过推动形成统一市场来实现。所谓统一市场,狭义上是一个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相对应的空间概念,广义上是指一个高级的市场经济形态,由市场主体、市场客体与市场中介所组成,既要求市场自由、透明、公平、有序,也强调政府管理、调控、规制、协调。一旦存在生产力发展障碍并导致要素市场系统紊乱时,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就会大大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显著降低。由此,形成统一要素市场,一方面需要在国内形成一个可以将各行业、各部门乃至各地区统一起来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庞大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应该主动利用全球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要素流动生态。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要素区域间流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分布上趋向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化发展程度和政府干预力度对区域间资源配置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的就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创新型科研人才欠缺等诸多制约其发展的难题。目前,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生产要素的聚合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要缩减东西部要素配置结构差异。东部地区往往资本吸引力较大、劳动要素知识水平较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拉动作用;西部地区要紧紧紧立足智能生产体系变革趋势,推动传统产业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丰富发展载体,推动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实际上,自2004年起,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就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增速了,尤其是西部地区,在2005—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幅超过30%,^[30]这为缩小西部和东部的要素配置差异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要积极缩减城乡要素配置结构差异。针对城乡要素配置结构中生产要素过度集聚于城市区域从而导致配置失衡、产出效益差、产学研严重失衡等问题,就需要通过多管齐下促进资源要素有效流通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生产要素应适度向农村倾斜,纠正过度向城市和非农产业集中的要素配置现状。

(三)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对要素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技术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技术,构建了产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的连接桥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据成为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要素之一,必须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兴起的时代机遇,改变传统工业生产资源消耗严重的配置模式,有效引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提升资源利用率,以推动现有业态与数字业态的跨界融合。一要积极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巩固互联网培育和引导机制,尤其注重5G基站、大数据平台、云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力度,实现基于创新机制的高质量发展。二要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效贯通和融合发展,培育高文化层次和高技术层次的人才,推进劳动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工资形成机制及相应报酬支付体系,倒逼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提高劳动要素生产效率。三要加快数据生产要素市场培育,持续推进政府数据开发共享机制建设,提升社会领域的的数据运用、整合与安保力度。借助大数据交易场所的建设,构建数据确权登记平台,并在数据供给和交易环节建立系统化的制度规则。在数据供给环节,从数据标准、数据生产到数据质量等方面推动数据供给侧的发展;在数据交易环节,探索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解决数据权属、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四)完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激发劳动要素积极性,形成良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流向必然引起广泛关注,而这一发展过程也是社会财富重新配置的过程。实际上,生产力的本质转型内嵌于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过程之中,两者本就是互相关联的,只有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才能真正完善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构建良好的分配格局,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和推进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劳动者素质和技术发展层次等市场因素差异,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甚至导致劳动要素错配和比价关系扭曲,阻碍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驱动向技术和劳动力驱动的转变。所以这就要求通过完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激发劳动要素积极性,再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而有效发展,对劳动力要素进行更全面的市场化配置。

注释:

- [1][7][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0、115、997页。
- [2][6][17][18][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57、207-208、442、390页。
- [3]《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马清槐、周锦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6页。
-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7页。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 [8][9][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91、55页。
- [10][11][1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56、21、93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8、811页。
-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 [2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0页。
- [22]《习近平带政治局集体学习 领导干部要学懂用好大数据》,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7/12/10/ARTI3HNR1LMiMiNZKmr1NMD1171210.shtml>。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6页。
-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6页。
- [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257、259页。
- [30]吴瑞兵:《我国劳动力价格变动对产业转移影响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9期。

[责任编辑:刘毅]